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贺县党史资料征集簡訊

第 一 期

中共贺县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編

1982年3月30日

目 录

编者的话	(2)
贺县传播马列主义的一个群众组织——贺县中学学生会	(3)
大革命时期贺县留穗同乡会的情况	(5)
抗日战争时期临江中学的革命活动情况	(8)
开辟贺信怀边游击区的前前后后	(13)
簡訊三则	(17)

编 者 的 话

《贺县党史资料征集简讯》，是贺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主编的不定期的内部刊物。目的是为了汇报和交流情况，搞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刊物的主要内容是：选载贺县党史资料，包括采访记录、老同志写的回忆录、历史档案资料摘录和重要革命人物的事迹、传略等。所载资料未完全作最后核实、考证。如有谬误，请读者提出意见，共同探讨。

为了办好《简讯》，殷切希望了解我县地下党活动和革命斗争情况的同志，特别是革命老前辈积极供稿。

贺县传播马列主义的一个 群众组织——贺县中学学生会

贺县中学曾经是贺县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这所学校是一九二一年春创办的。三月五日，第一批学生入学。开始有三个班（包括一个预科班和一个师范班），学生一百多人。

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成立的“贺县中学学生会”，是在贺县早期传播马列主义的一个群众组织。开始参加这个组织的有：汤有均、梁兆淦、黄启滔（后改名为黄一平）、古少章（后改名古天民）、官平洋（后改名官亦民）、汤有雁、蒋汝志、赖庆藏、李镇、李树宽、赖又辛、潘鸿钧、龙启现、黄观禄等。分设总务、文书、宣传、读书、贸易、互助等六个组。

成立学生会的动机，一是调解学生中的不同意见，增强同学中的情感；二是在学习上切磋琢磨，互相帮助；三是帮助学生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问题，诸如文具、纸张、食物的补充等，可由学生会贸易部负责采办供应，不用学生自己出街买，以减少中间的暴利。

学生会成立不久，便与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以及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一些学校、书店、报社取得了联系，订购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早主办的机关报《响导》，“五、四”时期著名的革命刊物，后来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党中央理论刊物的《新青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主办的《中国青年》和《少年先锋》等等。在进步学生中传阅、交谈，从

这些进步书刊中寻求革命真理，接受进步思想，初步受到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学生会的成员，不但自己认真学习，而且积极向广大师生宣传马列主义。由于外地的新生事物不断从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传来，所以学生会的活动范围和活动内容也不断扩大。根据全国学生联合总会的要求，学校以学生会为核心，成立了宣讲队、话剧团，经常走上街头或下乡宣传演出，向广大群众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联共、联俄、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和实行“二、五减租”的必要性。当时贺街的粤东会馆就是学生会主要的宣传阵地。每逢节日或纪念日，就组织群众和同学到此集会，由学生会选派代表登台演讲，激发群众的反帝热忱。象这样的宣传，有时遍及到永庆、莲塘等地，进一步推动了贺县农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当时，贺县在北京、上海、广州、梧州等地学习或工作的进步青年，如黄仲理、龙业鼐、廖觉民等也从外地寄回不少进步刊物给学生，向师生宣传革命道理，对师生的影响颇大。他们还在寒暑假时间回贺中向师生介绍外地学生、工人运动情况，指导学生会开展各项活动，使学生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到一九二五年夏天，参加学生会的已发展到一百多人。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接着广州又发生了“六、二三”沙基惨案，掀起了省港工人大罢工，反帝怒潮席卷全国。这时贺县中学师生的反帝情绪更为高昂。为了联合社会，扩大影响，贺县中学学生会又与城厢小学、三街小学、培英小学、育才小学以及育德女子小学等学校一致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各校师生纷纷集会，控诉帝国主义杀害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声援上海、广州工人的罢工斗争。曾经有两次，县城各校的几百名师生，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取缔日货”、“反对日本侵略”等口号，

举行示威游行，在街上登台讲演、散发传单、挨店、挨户检查仇货，把检查出来的仇货（布匹、百货）拿到贺中草坪，由贺县商会派人监督，当众焚毁。学生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反帝热忱，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的支持和拥护。

一九二五年终，学生会的同学陆续毕业，由于受进步思想的影响，许多人赴北京、上海、广州学习，继续寻求革命真理，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不少人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成为贺县早期的共产党员。

（贺县党史办公室收集整理）

大革命时期贺县留穗同乡会的情况

大革命时期，贺县在广州学习和工作的青年，组织了一个带有进步倾向的群众组织，名叫“贺县留穗同乡会”。成立的时间，大约是一九二四年上半年。地址在广州市豪贤街14号。这个组织的宗旨是：联合同乡，为改革社会贡献力量。具体地说，就是借用同乡会这个合法组织，发动贺县籍青年参加广州的革命斗争活动。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是：黄仲理（莲塘人），广州一中学生，共青团员。一九二五年被党组织派去苏联学习，毕业后派去内蒙活动（现在情况待查）；龙业甯（贺城人）广州二中学生，共产党员。广州起义失败以后，调去武汉全国总工会协助邓中夏工作，“四、一二”以后，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因病保释出狱，不久病故；詹冠珠（西湾人），当时在黄埔军校学习，参加了广州起义，被打伤腿，在同乡会里藏了数天，后化装逃离广州，

不久牺牲。同一时期参加留穗同乡会的贺县青年还有：黎竞豪、龙业鼎（又名龙舜琴）、龙业枝（又名龙季和）、龙锦雯、黄坤跃、黄时忠、黄翠英等等。他们都是大革命时期群众运动的积极分子，多次参加过广州地区的革命斗争活动，对推动广州地区的革命活动起过重大的作用。其中黄仲理、龙业鼎、黄坤跃、黄时忠等人还多次回县传播革命思想，推动本县的革命斗争。如一九二五年暑假，黄仲理、龙业鼎两人回到贺县，分别在粤东会馆面前和永庆小学操场召开群众大会，他们俩人都分别上台发表演说，听他们演讲的除学校师生外，还有当地群众共六百多人。黄坤跃、黄时忠等人回县后，多次以戏剧的形式，到永庆、白花、莲塘等地开展宣传活动，他们演出的话剧曾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二五年冬，黄仲理被党组织派去苏联学习，原留穗同乡会的成员除黎竞豪仍留在广三铁路活动以外，其余大部相继走散。留下一张一九二四年成立贺县留穗同乡会时摄影的纪念照片。这时，又以梁兆淦为首组织了新的同乡会。并由赖庆藏草拟了《贺县留穗同乡会成立宣言》和《告贺县兄弟姐妹们书》等文件，寄回贺县各机关学校。这一时期参加贺县留穗同乡会的大部份是贺县中学一、二班的学生。他们是黎竞豪（党员）、梁兆淦、黄一平（党员）、陈时新、赖庆藏（西湾人，团员）、张国威、张育坤、钟汉杰、李树宽等。主要负责人是梁兆淦，地点在广州市檬果树街十九号。以上成员分散在各个学校，其中黄一平、陈时新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其余分别在中山大学、广东法学院等校学习。他们经常集中一起学习讨论，研究国内形势，参加广州的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到街头宣传演讲，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这些活动坚持了一年多。

一九二六年冬，国共两党开始分裂，斗争日趋尖锐，留穗同乡会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统一了认识，尔后以“贺县留穗同乡会”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大体内容是：反对军事独裁，反对分裂，实行财政公开，反对南京国民政府、拥护武汉国民政府等。不久国民党开始清党，在广州掀起了清理左倾分子的反动逆流，留穗同乡会的成员大部份被通缉，整个广州被白色恐怖笼罩着，学校被迫停课，许多进步青年逃离了广州，贺县同乡会的人也随之走散。其中张国威、黎竞豪、赖庆藏、黄时中等潜回贺县活动了一段时间；李树宽跑去武汉，意欲找共产党收容所。但去到以后，收容所已经解散，后经孙科介绍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铁道部工作。

自此之后，贺县留穗同乡会的活动停止了一段时间，一直到一九二九年才又恢复活动。这时候的主要负责人是廖觉民（沙田人）中山大学学生，共产党员。解放后在广州工作，一九五八年病故。主要成员有：彭世祯（博白县人）、黄时煌、黄时琴、黄民初、黄瑞秋、赖又辛、梁石桥、黄东光、廖定模、陈 熹、苏小芬、张 帆等。地点开始在惠政路，后迁达明里。他们自筹经费，以廖觉民、彭世祯为主编，办了一份刊物，叫《涧水》旬刊。意思是从贺县山涧流出的清泉汇入大海。通过当时在广州的生活书店发售，寄回贺县各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推动贺县的革命斗争。刊物内容，主要是介绍社会科学，痛斥封建统治，揭露封建阶级的反动本质，宣传革命思想。多以诗歌、民歌、戏剧、散文等形式，利用民间情趣，以乡音推动社会。针对当时贺县的情况，指导青年放弃土客之争、冲破阻力，奔向革命。这份刊物大约出版了三十多期，后因生活书店被封闭，加之经费不足而停办了。

（贺县党史办公室收集整理）

抗日战争时期临江中学的革命活动情况

(根据访问何砺锋同志谈话记录整理未经本人修改)

一九三六年间，我原在桂林师专（以后改文法学院）求学。广西“六·一”运动期间，来了很多名教授，其中的邓初明，我曾经常和他接触。由于那时候我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曾被选为文法学院的代表参加省学联，并当选为省学联的常务理事。此后，我就参加办刊物，搞宣传，因为各方面的工作搞得比较出色，后来在上海的全国学联就不断派人来和我们联系，这样我们的革命宣传就更活跃了。由于抗日形势的日益发展，西大成立了“反帝大同盟”，我当时是这个组织成员之一，后来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工作停顿了一下，许多组织成员就转为党的地下组织。当时我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已经是由党组织安排，为党的革命事业做了许多工作。后来我们被捕了，有一批人到延安去，有一批人参加了学生军，我出来后，转到阳朔兴坪做小学教师，后到建设干校，再到临江中学。

临江中学是中共广西地下省委在抗日时期很重要的据点，省委书记钱兴在钟山英家和昭平黄姚地区住过相当长的时间，曾到过临江中学四次，和我见面接头三次，在我家住过两次。

据我所知，抗战时间到过临江中学的共产党员有：张其光、张镇道、刘周屏、李志高、苏健（苏燕萍）、郑思、邓建威、肖维宁（肖芳）、粟稔、冯娱修、孟树德、谢焕新、郑竹、苏丹、练以明、张铁生、何日先、叶长桑、吴动、张少桥、陈树模、曹国志、陈宗麟、何砺锋、

田季文、李峰等,这些共产党员来自四面八方,有的是在外地受迫害的,有的是暴露了身份被国民党追捕逃避而来的。临江中学原是一所私立中学,由黄研真、黄德占等一批资本家投资兴建,人事方面都不受国民政府管辖,许多进步人士和革命同志只要通过私人的关系就可到校任教。当时校长是李镇,我是训育主任,他也相信我,所以苏丹、练以明、粟稔等人,就是通过我的介绍到校任教的。那时候的党员教师都是担负导师(班主任)工作,所以在开展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方面,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学生中曾以“读书会”、“歌咏团”、“辅导员”等组织出面活动,介绍一些进步书刊给学生看,教唱一些革命歌曲,出版壁报“临江之声”,宣传革命道理;在辅导员中,通过对学生开展学习辅导活动,进行个别谈话,发展革命组织。当时参加辅导员组织的学生,凡是考上大学的,一般都参加了革命,不少人也入了党;有十多名未考取学校的高中毕业生,也在当地参加了革命活动。

临江中学是贺县革命的摇篮,也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据点。四四年秋,日本鬼子即将入侵桂林,全国知名文化界和政界进步人士柳亚子、何香凝、梁漱溟、陈此生、张铁生、杨永重、李济深、曹国志等人,相继从桂林疏散到八步,何香凝、陈此生、梁漱溟还通过我的联系,以“民盟”组织名义(为了统战工作需要,我当时也参加了“民盟”,与李镇、刘彦忠三人都是“民盟”组织成员),邀请他们到了临中,并对学生进行讲演。梁漱溟发表的“动员与民主”,陈此生的“治学与治事”,当时都印成了小册子在学生中广为流传,政界主要人物李济深的讲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无能和残酷的本质都作过尖锐的揭露与批判。这些知名人士生动活泼的讲演,对当时临中的师生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一九四四年六月,李嘉仁在广东受迫害来到临江中学(后任南方局

秘书长），当年夏季，桂林疏散，他带来一箱书籍，并将这批书籍存放我处。几天之后遂回广东。桂林疏散后，梁漱溟、陈此生住到临中，李嘉仁也来到临中，住在刘周屏、李志高那里，他代表广东党并通过我的联系找梁漱溟、陈此生商谈联合抗日问题。之后，李嘉仁、陈此生又准备从公会经苍梧下广东，但到了黄姚后，因形势发生了变化而折回，回到临江后，李嘉仁和我及刘周屏等又研究搞抗日武装问题，拟定政治上实行联合，搞统一战线，武装由我党掌握，委托我和李志高（以我为主）负责。此后，我起草了“战时教育方案”，决定在桂岭、公会设立两个分校，并亲自到了桂岭和公会两地视察和选定了分校校址。方案中提出对外口径是以办分校名义，如日寇入侵，即把临中往两个分校搬迁，继续进行教学活动；实际上是建立武装据点，把进步学生武装起来，必要时，动即可成旗号，拉起队伍对入侵之敌展开抗战。李嘉仁部署了工作之后，因暑假期间回去广东很久没有上来，这样，昭平、贺县、富川一带的抗战局面没有推动。后来据说是当时钱兴同志吸取了桂东南的教训，重点是积蓄革命力量，等待时机，不给轻易露面，不许过早暴露目标，以免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临江中学党的组织，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钱兴发展我入党后直接委派我负责建立，并明确交待我组织支部工作。（当时在临江中学近三十来个党员老师中，由省委书记钱兴直接联系的有四条线：苏丹、练以明一条，何日先一条，粟稔、冯娉修（据冯说，当时她的关系在广东）一条，我与陈真一条。除此之外的多数党员都没有组织关系。所以我发展掌握的党员是一个独立的支部，直接由钱兴同志领导，不与别条线发生横的关系。那时按照钱兴布置给我的任务，就是临江中学作为地下党的重要据点，要积极发展和积蓄革命力量，努力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和平地

把学校接受过来。根据钱兴同志的指示，后来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把临江中学和平地接管过来了。这对今后贺县的建党工作，开展游击活动，为游击区输送革命力量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活动基地。在组织发展工作中，我们做到了既严肃认真，又绝对保密。例如发展张志超入党，首先经过我多方面的考察确定之后，由他个人申请，写自传给我看过，经请示钱兴同意即可当面批准为党员，并立刻将自传和申请材料烧掉，即使敌人发现亦无从搜查，以保守党的机密。那时经我发展的党员，除张志超外，还有高二学生陈金华、陈灵明。另有粟健丰、甘天德、莫自育、张承模等四人，是由我介绍给钱兴同志，后来这几个人在广西大学和广西师院读书时都被吸收入了党。

为了便于我开展工作，经组织决定，调陈真（陈静）同志到芳林小学任教，担负交通员任务，负责我和上级的联系。陈真当时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同志，从柳州到八步的时候，天气还很冷，衣服单薄，一路上由钱兴同志陪同，对她问寒问暖，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帮她提东西，背行李，使她深受感动。到八步后，陈真才恍然大悟，知道钱兴就是省委书记，悔恨当时不该让他给自己背行李。

最后谈谈关于临江中学事件的情况。

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钟山县英家白岩塘泉公庙聚集武装群众举行起义，遭到了国民党政府派来大量自卫队、保安队和正规军的疯狂镇压。起义部队受到惨重的损失，临江中学这个地下党活动的据点也受到了敌人的高度注意。之后，由临江中学至八步的路上，每隔几百米的地方都设有敌人的岗哨。由于那时的临中是个进步的学校，各项革命活动都搞得很起色，很早就引起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注意。伪政府当局本想在英家事件之后，接着就对临中采取行动，但因学校还未放假，轰动太

大，会暴露他们的残酷手段，因此没有立即行动。

七月十四日，学期考试刚刚结束，部分学生已经离校，当天晚上深夜二、三点钟，一大群伪专署保安队把临中团团包围起来，立即把教务主任刘彦忠逮捕（当时校长李镇因病已离校休养），接着对全校教师房间进行大搜查。起初，在校放哨的学生还不知进来的是伪专署的保安队，就与他们争吵起来，学校职工黄焕章闻讯后拿出土左轮对付，弄得保安队大吃一惊。后来把全校教职员工的宿舍都搜查遍了，特别是我及所有辅导员的住房，搜查得更详尽，但最后什么可疑的东西也查不出来，只发现有郑竹的一些进步书籍。当时就把赵振强、陈灵敏、郑竹、欧学胜，连同刘彦忠等五人并一部收音机带走，有十多条枪把他们解押到八步。临走时也写了一张条子，说是除了上述物品外，并无拿走其他东西，并要我在条子上签字。当时我还是很镇静，没有被敌人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

在这五个同志被敌人带走后的当天晚上，芳林小学地下党员陈真同志马上跑到临中找见我，根据地下党“秘工条例”规定，要我立即离开临中。但据钱兴同志事前交待，能坚持就坚持下去，于是我还是继续留下，晚上派张志超在外面放哨，白天观察敌人动静。

十五日晚间，我到八步找见了黄研真（当时是可达公司经理、临江中学的董事），叫他设法营救被抓的几个人。第二天又见到李镇，他见我还没有离开八步就大吃一惊，并问我“你还没有走？”从他谈话口气猜测，形势已经有些稳定。过了一天，虽然欧学胜等人被释放出来了，但又发现从钟山增调来了许多兵员，当时的形势使人很难捉摸。后来我与李镇交谈，提出很有离开八步的必要。回校后从芳林小学黄树轮家知道了一些风声。第二天天黑，在黄启慈家又发现了新情况‘并知道有抓我的

逮捕证。于是当天晚上我即交待张志超，准备马上撤离临中，以后再派人员与他联络，并规定联络符号。两天后的一个白天，我就化装到了狮洞张孝球家，后又到了公会吴动家住了一晚，经吴动同志护送到昭平黄姚学生杨志洪处，住了几天，由临中在该地的学生筹集了路费，经苍梧到了香港。在大搜查后，学校其他党员教师也纷纷撤离了临中，伪专署企图逮捕临中地下党员的阴谋便宣告破产。在香港期间，我吸收了陈树模、陈灵明，并派他两人回贺县跟吴赞之接头，后派他到马峰一带工作。

开辟贺信怀边游击区的前前后后

（摘自何日先同志回忆录）

一九四九年春，我从贺县中学到临江中学当训导主任。当时学生利用公家的收音机收听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随时洒印发出全县各地。十天左右，学校就提醒，叫不要再收播了。再过十天的一个晚上，李镇校长叫我到他家。他问我：“你是否用过钟山籍贯，用过何日光的名字？”我告诉他我用过钟山籍贯，但未用过何日光的名字。他直接说：“现在八步专署接绥署来电，要抓钟山何日光，我看就是指你，你应该从速转移。”我回想起1941年在南宁尚实中学任教时，曾填过钟山凤翔人何日先的简历表，我当时在南宁是有点“红”的，何日光仅是何日先的“先”字之误。于是当晚我就离开宿舍，转到校园回黎霞煊同志（现梧州市教育局工作）处住宿，第二天凌晨通过黄公竞、曾贵平两同志转到

永庆乡莲塘苏丹同志处，从此完全转入地下了。时间是三月底。

我和苏丹同志是第一次发生组织关系。虽然我和他是贺中前后班同学，但那时他只是十五、六岁的小同学，没有来往。1946年他在临江中学教书，我们也没发生横的关系。这次见面，却好象是老同志一样了。我把与省委失了关系和跟陈保民刚联系上又被搞断了等情况告知他，他也把他在里松和陈的关系及陈被害情况告诉我，同时还说我的关系等有刘哥同志来时再决定。

在苏丹同志处住有十多天，彼此交换了许多意见，他给我看完了当时所有地下党组织文件后商量我的工作问题。他说，现在全县都基本安排有游击区了，只有南乡、双程、五甲三个乡还算空白区，那里地主堡垒较顽固，匪特活动较猖獗。叫我到那里独立开展工作，我很乐意地接受了。他还提出通过陈勋同志先安排我到五甲野鸭村，再转七分找欧阳昭同志，然后到上程卢文秀同志处，站稳脚跟，以后到南乡找罗日新同志。

约在四月底，我在苏丹同志处见到黄传林同志。他听我讲完我与钱兴同志单线联系上的情况后，说：“钱兴同志在广宁失踪到现在半年多了，交通点都没有他的信息，如果他在，你的关系由他接，如果不在，我负责给你接起来。他临失踪前个多月，曾跟我讲过你是共产党员，又是个医生，叫我回贺县同你一起出来。但当我回贺县时叫他开介绍信，他又说他还要到贺县一趟，那时他再带你一起出来。就在那次我离开他后，就由于他坚持在广宁游击区，与敌人遭遇冲散了而下落不明。”随后，黄传林同志就宣布派我为贺信怀边游击大队长，苏丹兼政委。

凭我十多年来地下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很快就在这三个乡打开局面。再加上我在贺中时革命干部储备的计划和苏丹同志在人力物

力的大力支持，因此对于发动群众，组织武工队，开展统战工作，反敌特的侦察、破坏等工作，都是比较顺利的。特别是解放军渡长江，敌人兵败如山倒，使我们的工作进展更快。五甲乡我以李达喜、李上达、李可芳、欧传兴、白××等为骨干组成五甲中队；双程乡以卢文秀、卢品秀、余达文、于明辉、欧永源为骨干组成双程中队；南乡以罗日新、何畏、吴望鸿、吴品伯等为骨干组成南乡中队；最后还在怀集县西区靠近双程南乡的兰钟乡组成一个中队。自中秋节从武工队搭起架子到解放时已达三百多人枪。由于有了农民自己的武装，随简组织农会，基本群众大都已参加。接近解放前夕，怀集西区、北区的地下武装，提出要求我队收编。我回来跟黄传林同志联系，他同意由我负责收编，我兼他们大队的政委，其他干部由原有干部加以调整解决。后来由于贺县于1949年11月21日解放了，我在怀集进行收编尚未就绪，中途就返回来。

我在这个“空白区”开辟工作，站稳脚跟，便立即发动群众起来反征兵、反征税、反征粮的工作。七、八月间，敌人开始在临江在桂岭河封锁我们，在三个重要渡口派特务监视。敌人在外围封锁，我们就在金鸡山脚欧永源家开办武工训练班。敌伪悬赏八千元金元券要抓我，并扬言要抓住我好过个快乐的中秋节。结果使他们大失所望。

这时苏丹同志介绍莫细华同志到我大队任付大队长。力量加强了，我就决定让莫细华同志在下程于家为基地，向信都方向发展。并介绍他去仁义乡找钟家佐同志，以便在信都开展工作。中秋节后，信都谢上昭同志也从外地回来，苏丹同志并派他回信都独立工作。这样我们这个地区全面开花了。

革命形势发展得快，贺县伪县长岑孟达，敌特头子钟芷生的花花公子钟××有些着急了，于是派特务到处侦察，他们派了探子化装为地理

先生深入到双程侦探情况。群众发现后把这个探子抓住。当天我不在家，其他同志不敢擅自处理，就关在山沟里，派武工队看守，但到深夜却给他逃走了，因此暴露了我们驻地。于是在十月间，伪县自卫大队一百二十多人枪就杀奔我们根据地土程村（现永和大队）来了。当晚敌人到达下程伪乡公所驻下，四出附近村庄见鸡就抓，见猪就杀，真如土匪一样。我们武工队知道后立即给以枪击，敌人才有所收敛。下程群众当即派代表到我们据点金鸡山脚来，要求坚决跟敌人打。为了群众利益，我们决定接受群众的要求，当晚九时许，赶出上程，这时武工队已集中几十人，赶到下程时，又齐集下程武工队成百人，到上下程交界的一个山坳险要地点，决定安排以五支单响三支长统火药枪和几把马刀在这里打击敌人前哨一个班，夺取机枪后控制制高点，堵住敌人进入上程。还在右侧冲槽沿途埋伏一百支粉枪，准备吃掉敌人前头一个中队，打跑后头。另安排下程的三十多人枪牵制敌人进攻。于是立即行动，先封锁交通，不许泄漏军机，第二天由附近瑶民送饭上山来吃。中午敌人刚进入伏击圈，尚未进入有效射程境地，突然一个武工队员被人叫醒作战斗准备，他擦擦眼睛举起粉枪就要打，被旁人将他按下，他停下枪片刻，突然就打了一枪。伪自卫队前哨还以为是人家的打鸟仔的，不料另一处又打响第二枪，敌人就嚷起来“土八路！是土八路！”于是敌人就开枪冲锋，从中间抢上山头，迂迴到上程去了。这一仗不能按计划打好，大家都有意见。但开枪给敌伪报信的人，当时不好肯定他是故意的。后来到信都整编时，才把他整编回家生产，最后他真的参加反动组织，被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这仗虽没有打好，但伪自卫队害怕我们从怀集调队伍来，第二天清早就悄悄地转移南乡去了。第三天我们就将情况向苏丹、吴赞芝领导同志

汇报。接着伪平乐专署就气势汹汹地准备派伪保安队两个连来进攻我们，幸得吴赞芝同志策动在大桂山虚张声势，使敌人转移目标，奔向大桂山，结果敌人又扑了个空，我们就赢得时间了。我准备把怀集武装收编后，有把握地以金鸡山麓为盘子开展贺怀边的游击战争。由于怀集西区已成为我们回旋的好地方，敌人也就躲在南乡不敢轻举妄动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贺县解放了，当时我正在怀集西区进行收编两个游击大队的工作，听到消息，我赶回南乡、双程布置好工作，11月23日到野鸭，第二天收缴伪县自卫大队全部武装。25日黄传林、苏丹两同志当面安排要我带领全大队三百六十多人枪和一个二、三十人由贺中学生刚组成的政工队下信都，协助解放信都县。当天上午准备行装，下午四时出发，连夜赶至信都。我们一到信都，当时伪县长已逃亡，伪自卫大队也已跑到仁义乡的大桂山脚。仅两天内，我们协助谢上昭同志成立信都县解放委员会。第四天，根据谈判条件，就接收伪自卫大队缴械投降。接着信都县八个乡的解放委员会也相继组成。

简 讯 三 则

(一)

在广州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共办了六届，训练了大批农运干部。我县有三人参加过学习：

黄一平（原名黄启滔、黄田新村人），是第五届农讲所学员。时间是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四日至十二月八日，主办人彭湃，并在学习期间由黄天素、黄自强（均系广东龙川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十